

政德镜鉴⑩

有官员和大学士孙廷铨交情浅薄，便暗渡陈仓，偷偷给邱璐送礼，想让他孙廷铨面前美言几句。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时，给孙廷铨送了两份“厚礼”，一份是一罐清水，另一份是托情官员的退礼名单。孙廷铨感叹道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才是真实邱璐！”

邱璐：清风两袖慰平生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本报通讯员 闫鑫霆 吕明慧



邱璐画像

半朝銮驾盖棺定论

《淄川县志》有邱璐小传：“（邱璐大兴县）秩满，升扬州府江防同知。捐资制放生船。岁饥则赈贫，疫作则施药。值江水泄溢，商舟不至，推税额出，削秩易产。事甫释，而已资志歿矣，时论为之太息焉。”不仅说了邱璐在扬州的政绩，还提及邱璐罢官后，变卖田产填上了亏空，才平息了此事。当时人们提及此事，便为此长叹。

瓜洲古渡也似乎为邱璐这位勤政清廉的好官鸣不平。从康熙五十四年（公元1715年）开始，江流主流北移，瓜洲开始被侵蚀。到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，瓜洲江岸80丈塌入江中，其后不断坍塌。虽然花费巨资多次维修，但终未能保住瓜洲运口。光绪二十一年，瓜洲全部坍入江中。昔日的繁华街景、亭台楼阁、名园翠苑和坚固的城池付诸东流，随着邱璐的治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清初大学士、博山人孙廷铨和邱璐是莫逆之交。民间传说，孙廷铨非常敬重邱璐的人格和品行，便借回乡省亲之机拜访邱璐。州府县衙的官员得到这一消息后，挖空心思、变着法子讨好孙廷铨，怕他不肯收礼，就将金银珠宝藏入西瓜里送往孙府，一时孙府“瓜多为患”。

有的官员和孙廷铨交情浅薄，便暗渡陈仓，偷偷给邱璐送礼，想让他孙廷铨面前美言几句。邱璐在与孙廷铨相见时，给孙廷铨送了两份“厚礼”，一份是一罐清水，另一份是托情官员的退礼名单。孙廷铨感叹道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才是真实邱璐！”

孙廷铨本想通过这次省亲，给邱璐增加一些生活补贴，然而邱璐不但没有收一分钱，还搭上了招待客人的饭资。孙廷铨一语双关的说：“你呀，还真真是个邱老实人啊！”（邱老实，邱璐谐音）。回京后，孙廷铨就将邱璐拒收礼品的事上奏康熙皇帝。

后来，康熙皇帝南巡，在山东特意召见邱璐，并赏赐了一对金毛狮子、玉毛狗。邱璐拒不受纳，说：“我已罢官回家，粗茶淡饭足矣，用不着这贵重的东西。”

邱璐晚年时，康熙皇帝感佩邱璐的人格品德和对朝廷做出的贡献，就赐给邱璐“半朝銮驾”。所谓半朝銮驾即正官娘娘的出行标准，皇上一般赐封给皇亲国戚或卓有功勋臣子出巡。邱璐的半朝銮驾，包括黄顶官轿，金瓜、钺斧、朝天蹬等。这幅半朝銮驾原由邱氏后人在巩家坞村收藏，后移至王村镇尹家庄邱氏祖祠中。

只可惜，在康熙皇帝心意回转，准备重新重用邱璐时，邱璐却在康熙二十一年抑郁而卒，享年六十二岁。邱璐死后，葬在老家的“官占墓田”。有一杨姓义士自愿做了邱璐终生侍卫，死后葬于邱璐墓旁，永远相随清官左右。

五十年前，邱璐墓葬曾被打开，里面除了一具石棺和一副木柩，随葬品和普通人家别无二致。邱璐为官一世，布衣慰平生，上不愧天地，下不愧百姓。清廉当为后人记住。



邱璐时常在豹岩观内与好友相聚

卢昱 摄

括出修志的原则。

在邱璐看来，邑志所修，不仅有益于国史的修撰，更可以“因志徵俗，因俗出治；因文考义，因义垂法，一举而众美萃矣”。邱璐可称为有识之士，其从修志的过程中，悟出了通过修志，可以找到治理天下的良策法规，可见其眼光高远。

沁水历史上凡九次修志，明代四次修志，至今无一传本。正是这一目标的驱使，使邱璐一改明代历届沁水县令亲自修志之习，首开县令躬身修志之风，不辞公务繁忙，致力于修志。清代沁水四次修志，流传至今者三部，沁水悠久的人文历史、风俗习惯等等，赖以得以保存、流传。凡为官一方者，首要者在于造福一方，文化建设自然是其重要一环。

邱璐所作的志序对沁水后世影响极大，多有引用。光绪版《沁水县志》记载：“支分大行之秀，气联王屋之奇，龟蛇呈形，金水结聚，群山环拱，众壑深润。险出于天成，胜概收其精气。”便出自邱璐语。虽然邱璐在沁水为官短暂，但他为沁水人留下了一本《沁水县志》，成为沁水人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。

邱璐在沁水尽职尽责，两袖清风。在《沁水县志》艺文中，收录了一首邱璐的《登碧峰山即事》诗：“结伴乘幽兴，携樽陟碧峰。绕城山矗矗，赴壑水淙淙。曲径消烦热，灵泉荡俗胸。摩碑寻好句，鼓掌问奇踪。醉客攀栖鹤，禅僧制毒龙。乱云藏叠嶂，返照系孤松。览胜皆流憩，寻闲偶放慵。蓬瀛如不远，茧足更相从。”

虽然身为沁水县令，邱璐在沁水百事繁忙，体倦心疲，公务之余，邀众携酒，碧峰遣情。他似乎从来没有发现碧峰如此令人陶醉不拘，官场俗念、尘世繁情一下子全飘出山外，使他浮想联翩：蓬菜、瀛洲如果近如碧峰，他会立刻放下手上公务，穿上草鞋，抬脚便去寻胜。对于官场，邱璐本就没什么迷恋。

由于政绩突出，顺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正月初六，顺治皇帝下旨对邱璐进行褒奖，授邱璐为文林郎，妻彭氏为孺人。

瓜洲商贾刻碑颂

康熙六年（公元1667年），邱璐由山西沁水知县转任直隶大兴县知县。大兴县和宛平县属顺天府直管县，其余各县则为直隶和顺天府共管。因大兴县为天子脚下，故称“都门”。所以，这次邱璐到京城属地任职，实属得到了

朝廷的重用。

邱璐在大兴县期间，不敢懈怠，恪尽职守，通过加强保甲制度，教化乡民，杜绝了百姓一人犯罪而受到牵连的现象，民风大好。同时，摸清房产底数，杜绝了户门大族隐瞒漏报房产现象的发生。不仅为朝廷增加了税额，还让大兴县的社会治理井然有序。

邱璐到任顺天府大兴县不久，因政绩卓越，于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再次得到了朝廷褒奖，赠为奉直大夫、知县加一级，其父母皆有封诰，其妻彭氏诰赠宜人。

康熙八年（公元1669年），邱璐因政绩卓著，升任江南省（江苏省）扬州府江防同知，分掌瓜洲押口，专职征收税银。

清代沿沿江地区若干冲要之府置江防同知一人，以协助知府专管江防事宜。扬州府江防同知署在瓜洲渡驻扎，本镇民事，一并理之。瓜洲是京杭大运河入长江的重要航道枢纽，每年漕船数百万，航运繁忙、贾商云集，是朝廷的主要税源地。

瓜洲因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诗作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”而闻名。瓜洲更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唐宋年间始有城垒，宋时在此御防倭寇，明代便建有江防同知署。

从京城到扬州，邱璐这一步跨越，可谓成功。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，江南民众反抗最为激烈。即便是在清业已定的清初社会，对明朝的眷念仍是不少江南士大夫的共同心理。因此，对于清统治者来说，“江南”一词在清初政治中暗示着一种敌对或者反抗的情绪。

康熙帝对江南的人事布局一直未敢掉以轻心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江南积聚的财富。康熙年间成书的《江南通志》中说：“国之大计，以财用为根本，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，漕精当天下十之五，又益以江淮之盐荚、关河之征催，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”。商旅辐辏，位置险要，而且“仕宦科名皆为诸省之冠”，因此“国家鼎建两江之外，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”。江苏事务也一向号称“繁剧”，清帝一般委以心腹重臣，并对其政务多加考察。

可时移世易，命蹇时乖。这次邱璐履扬州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，而是遭遇他人生的最低谷。据《淄川邱氏族谱》记载，邱璐知瓜洲时，朝廷规定：凡携货过瓜洲渡口者，只要是用车载、船运的大商人，必交过路税；“背负

肩挑”的小商小贩，则可以免之。

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久而久之，来往商贾有了应对之策，即快到渡口时，车船暂停于数里之外，然后雇人用“背负肩挑”的办法，装作小商贩将货物化整为零，通过渡口，再换装别的车船而去。这样，就可以减轻纳税负担。邱璐十分体恤民情，就默许商贾的做法。为此，瓜洲的商贾撰文刻碑颂扬邱璐。

半缺税家产尽绝

明末清初，淄川有一个文化圈，这些读书人，或诗或文，交友结社，结伴交游，关系甚笃，皆有声誉。邱璐与当时邑内名人多有交往：曾任吏部左侍郎、刑部左侍郎的高珩，与邱璐为儿女亲家，高珩之子高之驩娶邱璐之女；孙廷铨官拜内秘书院大学士，曾官至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要职，与邱璐结交于京城，关系堪称莫逆。

蒲松龄与邱璐及其子侄皆是至交好友。蒲松龄把自己“郟中诗社”的诗友王鹿瞻，介绍给邱璐做幕僚。随后，蒲松龄也在康熙九年，来到同属扬州府管辖的宝应县，在时任知县的同乡孙蕙之官衙做幕僚。

邱璐任扬州府江防同知，管理瓜洲渡口的财税，其长子邱翊圣相随任所，帮办衙内事务。据蒲松龄《鹤轩笔札》中的文稿，康熙九年冬，孙蕙出面联系，要把其内弟赵湛如在新庄、自己在王洞的房屋田地卖给邱家，让蒲松龄代为致信邱璐、邱翊圣，商量费用及付款方式等事宜。

蒲松龄所写的《十一月念一日上瓜洲邱、代孙蕙》一信，谈到新庄交易定金650两白银，再加王洞房产田产，约计总数在1400两至1500两左右。之后，《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瓜洲，代孙蕙》又谈到已符合约托来人捎到邱氏衙门。在《十二月八日答邱九兄，代孙蕙》中，蒲松龄以孙蕙的口气写给邱翊圣，委婉地催促邱家早日交易。

康熙十年（公元1671）正月，蒲松龄代孙蕙起草《同日与邱勳宸，代孙蕙》，讲明自己囊中羞涩，进一步催促邱家尽快交易。四月十五日代拟的《同日答瓜洲书，代孙蕙》明确讲明自己急需金钱，邱家先付一半价款就可成交。

而邱璐虽然身为同知，家中尚无此巨款。蒲松龄便在《十九日上瓜洲，代孙蕙》信中对邱家拖延时日，不能按期完成交易表示理解：“比年来老大人跑旆江乡，仅有清风两袖，况自都初旋，则床头之羞涩，可想而知。卑职遂为冒淡，似乎其情不爽。”同时表明自己的苦衷：“第不堪家叔之逼勒，遂不得已而有将伯之呼，区区此衷，想蒙台鉴乎？”急切申明：“万恳挪赐半价，以付来人，则佩厚德于无疆矣！稟启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”

买不起房子，更担不起风险。据史料记载，邱璐在扬州四年多的时间，运河扬州段连遭水灾，4次决口。清水灌是运河决口的频发地段，河宽堤薄，“费百万筑之无效”。洪水泛滥，势如雷霆，村庄全被冲垮，黎民呼号连天，灾情十分惨烈。扬州洪灾《清史稿》《扬州府志》《河渠纪闻》均有记载。

洪水泛滥，使得昔日商船云集的古渡，变为商船不至的空港，导致了税银亏空，因此邱璐被罢免官职，还得将缺税补足。

家中实在没钱，尚需朋友相助。邱璐的好友韩庭芝解囊相助，王士禛曾对此记述道：“淄川邱君璐，官扬州同知，遭官钱罪且及孥，公解金赠之无吝色。”

而当年没有做成房屋买卖的孙蕙，也没有落井下石。高珩在《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》讲述：“邱君荆石缺税未补，家产尽绝，代为理豁，得援例以免。”这便是赞扬孙蕙慷慨好施，为邱璐上下打点，使其得以免罪。

名流影像

经受佛道冲击而日渐衰微的儒学，在宋初“泰山先生”“徂徕先生”“安定先生”这里汲取到新的营养，产生了理学体系的萌芽。

宋初三先生与泰山书院

□ 李文娟

山东是宋代儒学复兴的肇始，“宋初三先生”胡瑗、孙复、石介作为北宋理学先驱，以泰山书院为依托，讲学授徒，声名远播。四方学者慕名前来求教切磋，逐步形成“泰山学派”，对山东地区的儒学传承和乡风淳化起到很大作用。

最早来到泰山书院讲学的是孙复。孙复(992年-1057年)字明复，号富春，晋州平阳(今山西临汾)人，因长期在泰山讲学，时人尊称“泰山先生”。孙复自幼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不顾贫寒，饱读诗书，一心立志求学入仕，却接连三次考场失利，苦不堪言。宋仁宗天圣五年(1027年)，范仲淹回南京(今河南商丘)为母丁忧，并应邀在应天书院主持教务，见到了流落至此的孙复，谈话数语，受益良多，当场资助千钱。为了让孙复安心求学，范仲淹又推荐他在应天书院做职事，一边干活一边学习，这样不仅衣食有了着落，还有能力赡养年迈的母亲，孙复甚是感激。应天书院坐落在南京繁华的闹市之中，藏书数千卷，文化精英相聚于此，天下学子仰慕皆归之，盛极一时，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。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下，孙复跟着范仲淹攻读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，为日后讲学打下基础。

1028年，范仲淹丁忧期满，回到京师任职，孙

复随后也离开应天书院。1034年，孙复第四次赴开封参加科举考试，不幸在殿试时落选，未能得到官职。此时，孙复满腔惆怅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南京学官石介。石介推崇孙复的学问和追求，邀请其到泰山书院讲学。泰山书院处于泰山凌汉峰下，雄浑肃穆，钟灵毓秀。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帝王在此进行封禅和祭祀，文人雅士亦喜好来此游历。泰山书院，算得上是一个追求圣人之道最佳去处。对孙复来说，虽然生活清苦，精神上却是执着充实。

经过大半生的努力，孙复的才学终被认可，在石介和范仲淹的推荐下，50岁时得到国子监直讲一职，1044年，宋仁宗赐孙复五品服。孙复在当时以讲《春秋》著称，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《春秋尊王发微》12卷。此书的思想就是为“尊王”确立大义名分，他列举许多事例说明怎样才能做到“尊王”，使诸侯和大夫不得随意破坏礼乐传统制度。这部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，对于“治世之道”多有发挥，引起了宋代学者对《春秋》的重视。

石介(1005年-1045年)字守道，号徂徕，兖州奉符(今泰安市徂徕镇)人。进士及第，为母守丧期间回到徂徕山，拜孙复为师，于泰山书院读书讲学，因其品德高尚，从学者甚多，世称“徂徕先生”。石介刚直不阿，愤世嫉俗，是三位先生中个

性最鲜明的一位。其年轻时在应天书院跟随范仲淹读书，刻苦勤奋无人能比，26岁即中进士甲科，担任秘书省校书郎，郟州观察推官等职。宋仁宗宠幸美女，不理朝政，石介上书直谏，由此惹怒仁宗。1043年，范仲淹等人推行“新政”，石介积极参与，写文章批评夏竦等大臣，被卷入朋党之争，成为保守派的死敌。

在维护儒家道统面前，石介又如堂·吉诃德一样冲锋陷阵。对石介来说，延续儒家道统比一日三餐更重要。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扬雄王通韩愈”，每一日都吟诵于口；“君为尧舜之君，民为尧舜之民”，每一刻都记挂在心。他推崇韩愈力排佛老的决心与胆识，也撰写《怪说》《中国论》等文章批判佛老，大胆揭露佛老的妖妄怪诞、淫巧侈丽。“道大坏，由一人存之；天下国家大乱，由一人扶之。周室衰，诸侯竞，道大坏也，孔子存之。孔子歿，杨墨作，道大坏也，孟子存之。”（《徂徕先生集》卷八《教说》）孟子之后，佛老的盛行使道统遭到破坏，石介将维护道统视为己任。

除了排斥佛老，石介的思想还表现在通过儒家道统为“君统”正名。他说：“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孔子以至于今，天下君也，中国一教，无他道也。”（《徂徕先生集》卷十三《上刘工部书》）石介认为，君统与道统同样重要，都是由天地万物的根本“道”来统摄。他

又说：“道于仁义而仁义隆，道于礼乐而礼乐备，道之谓也。”（《徂徕先生集》卷二十《移学诸生》）经过这样推理，将“道”贯穿于君统、道统、礼乐等一切之中。尽管思想粗糙，没有细致展开，但也具有了理学思想的端倪，“道”成为后来宋代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。

1045年，石介因被人陷害遭到外放，精神上受到打击，一病不起，去世时仅有41岁。欧阳修与石介是同年好友，闻讯石介被迫害致死，悲伤不已，“我欲哭石君，夜开徂徕编，开编未及读，涕泗已涟涟”，他对石介“刚正直烈”的性情非常敬佩，在其撰写的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中称赞其有“时无不可为，为之无不至”的勇者气概。

胡瑗(993年-1059年)字翼之，祖居陕西安定堡，世人尊称“安定先生”。与孙复、石介不同的是，胡瑗出自官宦家庭，家族世代显赫，但至其父胡訥时，仅为宁海节度推官，俸禄较少，家境逐步沦落到无以自足的地步。据《安定学案》记载，胡瑗年轻时前往泰山，与孙复、石介一起粗茶淡饭，勤学苦读，终夜不寝，十年没有回家探望亲人的心境，后人为了纪念胡瑗，在他投掷书信的地方立起石碑，取名“投书洞”。

学成后，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，在江苏一带

讲学，于泰州建立安定书院，传授儒家经术。范仲淹对胡瑗十分敬重，视为知己，并多次举荐其入仕为官，胡瑗先后任职太子中丞、光禄寺丞、天章阁待讲等，最后主持大学。胡瑗是三先生中授徒最多的一位，传说弟子数千人，对当时的学风深有影响。正是在他主持大学之时，遇到18岁的程颐，两人相谈甚欢。程颐性格孤傲，称呼自己的老师周敦颐往往直呼其字，但是对胡瑗却是极为尊敬，一直以“安定先生”相称。胡瑗教学二十年，实行分科教学，分出“经义”（学习六经）和“治事”（致用之学）两科，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被命名为“苏湖教法”，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分科教学的先河。后来，京师大学也采纳这一教学方式，并称之为“太学法”。

胡瑗关于《春秋》《周易》《中庸》《尚书》等经典多有论著，大都已佚，仅留下《月河精舍合钞》中的《安定言行录》和《宋元学案》卷首的《安定学案》，以及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周易口义》可考。他的学生徐积谈到：“安定说《中庸》，始于性情。”（《安定学案》）胡瑗坚持孟子性善的观点，试图从理论上梳理人性善与情欲之间的关系，依据人性善等道德原则去齐家治国。（侯外庐、邱汉生，张岂之：《宋明理学史》上册）从胡瑗的著述中，也可看出理学的端倪。由于孙复、石介、胡瑗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，所以在学术史上仅作为儒生来看待，并未被列入儒家道统之内。

经受佛道冲击而日渐衰微的儒学，在“宋初三先生”这里汲取到新的营养，产生了理学体系的萌芽。明熙宁年间，为纪念“宋初三先生”对理学的贡献，在泰山书院设立“三贤祠”供奉孙复、石介和胡瑗。正是泰山的仁厚、仁厚、雄壮铸就了三先生的儒者气概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追寻三先生道统学术的踪迹，可以感受到他们立志向学、安贫乐道的精神。